

明代大藏经 丝绸袈裟研究

杨玲 主编

学苑出版社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明代大藏经丝绸袈裟研究

杨 玲 主编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明代大藏经丝绸袈裟研究 / 杨玲

主编. —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077-3912-1

I. ①北… II. ①杨… III. ①古丝绸—研究—中国—明代 IV. ①K876.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3449号

责任编辑: 洪文雄

装帧设计: 徐道会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010-67675512 67678944 67601101 (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彩蝶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 889×1194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380千字

图 片: 604幅

印 数: 1500

版 次: 2013年3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0元(精装)

主编：杨玲

副主编：韩战明 薛雁

项目统筹：王群

撰稿：穆朝娜 王淑珍 田晓 刘远洋 王群 韩战明

图片说明：穆朝娜 王淑珍 刘远洋

摄影：孙之常

序

华丽风采：明代丝绸的实物展现

万明

文化充满了一切空间和时间，无所不在地渗透到各个领域。有明一代近 300 年，时间之痕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遗产，其中，丝绸是一颗璀璨的明珠。

大藏经丝绸封面的研究，把我们带进明代文化史。

有明一代，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集大成的时期。一提到明代文化，我们可以如数家珍般地列举出《永乐大典》、《天工开物》、《农政全书》、《本草纲目》、《徐霞客游记》等一系列巨著，反映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文化史，主要包含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在明代近 300 年间，这两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发展。其中也包括明代大藏经的 6 次刊刻，《洪武南藏》（又称《明初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嘉兴藏》等，成为佛教经典刊刻的一个高峰。大藏经是佛家典籍的总汇，也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永乐北藏》是现存完整大藏经最早也最为精美的一部，是明太宗朱棣敕命编纂，于永乐十九年（1421 年）在京开始雕版，英宗正统五年（1440 年）完成，后于明神宗万历十二年（1584 年）加以补刻的。特别是，永乐至万历年间官刻的大藏经，史无前例地采用了丝绸作为封面，成为迄今一大批弥足珍贵的丝绸精品保存于世的特殊形式。对于丝绸研究者来说，实在是幸莫大焉。杨玲女士主持的北京艺术博物馆课题组，以对明清皇家寺庙珍藏明代大藏经封面丝绸的系统整理，完成《明代大藏经丝绸袷封研究》一书，即将出版，对于明代文化史，这部书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大藏经》袷封俗称经皮。明代大藏经经皮保存了大量完整的明代丝织品，因其完整性和连续性，成为研究明代丝绸的重要史料。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开创我们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文化史研究的前辈沈从文先生，已揭示了这批宝藏的珍贵价值。他在 1953 年发表的《明织金锦问题》一文中说：“明代用于佛经封面的丝织物，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因为这是目下我们知道的，唯一研究明代和唐宋以来丝织物的重要材料”。众所周知，沈从文先生的前半生是文学家，后半生是历史学家、文物学家。

他完成出版了中国首部大部头的《中国古代服饰史》，对于丝织品有独到的研究。他当年以慧眼辨识了本不起眼的佛经“封面”上裱装的丝绸织品，1954年为故宫李杏南先生编《明锦》一书作《题记》，特别提及：“目前所知，国内现存明代经面锦，至少还可以整理出近千种不同的图案，这份宝贵遗产，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内容，可以作为研究明代丝织物花纹的基础，也是进而研究宋元丝织物花纹的门径”。还殷殷指出：“必须全面深入地来理解，来分析比较，才可望得出更正确的结论”。《明锦》一书，汇集故宫所藏佛经封面丝织物出版图录42幅，使学界初识了明代丝织品的原貌。今天，杨玲女士主编《明代大藏经丝绸裱封研究》一书，以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2千多件大藏经经皮，即传世丝织品作为主要资料，经过全面整理和研究，就大藏经经皮的历史背景、丝织品的图案和组织形式等，撰写了系列专题论文，探究了明代丝绸发展的真实状态，无疑将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大藏经封面的研究，把我们带进丝绸文化史，也把我们带进世界文明史。

中国丝绸是华夏五千年文明最著名的文化载体，也是世界文明史中最灿烂的文化结晶。丝绸的发源地是中国，悠久的历史，孕育了中国古老而独特的文化。早在黄帝时期，就有“蚕神献丝”、“天神化蚕”之说，到了殷商时期，中国已可以织造带有精美花纹的丝绸。那么发展到明代（1368—1644年），我们享誉世界的丝绸究竟发展到什么样子或者说什么水平了？这是我们自己首先应该搞清楚的事情。仅仅根据文献资料的记载，总让人感到含糊不清；而丝绸不易保存，是古代艺术品中最难保存下来的，也正因为如此，这批经皮的分析与整理，对于丝绸文化的研究，具有特殊的重要学术价值。

所谓物质文明，是指人类物质生活的进步状况，是精神文明的物质基础。明代是一个手工业生产和工艺制作空前发展的时代，明代丝绸生产有中央和地方两大系统，根据《明会典》记载，属于中央的有四个织染局。“两京织染”分设在南京和北京。设在南京的称内织染局，生产丝绸专供皇室。传世实物佛经封面展示了明代丝绸的时代特征，在装饰中显示出多样的风采和浓厚的美感，反映出传统丝织手工生产工艺到此时已走向顶峰时期。

佛教在传统中国的弘扬，是不同文化相互融合的一个成功范例。明代《大藏经》的刊刻，配以珍贵的传统丝织品作为封面，同样是中外文化相互融合的一个成功范例。中国曾是世界上唯一能够生产丝绸的国家，我们的祖先不但发明了丝绸，而且从西汉开始，中国丝绸就大批通过陆海两条“丝绸之路”向外输出，对世界文明史作出了重大贡献。发展到明代，

中外文明交流曾经达到两次高潮，一次是明初郑和七下西洋，另一次是晚明中西直接接触交流。无独有偶，明代佛经的刊刻，正是发生在永乐至万历年间，与两度高潮在时间上重合。这也就提示我们，明代中国丝织精品的产生，与中外技术与艺术的

交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明代的丝织品和瓷器远销国外，不仅青花瓷独步世界，丝织品中的织锦等也具有享誉世界的代表性。从丝织品的图案来看，丝织品衣饰用金盛行于元代，已与宋代崇尚淡雅的风格迥异，明代全面加以承继并有所发展，进一步融合西域织金绮的用金技术多达 33 种，表现出前代无法比拟的丰富性。丝织品趋于精品化，质量之精美、品种之繁多，在明代达到了历史上空前的程度。

杨玲女士主编《明代大藏经丝绸袈裟研究》展现给我们的，正是传世明代丝绸的华丽风采。

2011.10.8

目 录

序 · 华丽风采：明代丝绸的实物展现 / 1

壹 · 论文篇 / 1

明代丝织品的发现、收藏与研究 / 3

明代大藏经丝绸袈裟的历史背景 / 14

明代大藏经丝绸袈裟的图案 / 24

明代大藏经丝绸袈裟的织物种类 / 49

贰 · 图案篇 / 65

叁 · 品种篇 / 237

图版目录 / 299

后记 / 303

壹·论文篇



明代丝织品的发现、收藏与研究

穆朝娜

在中国丝绸史上,明代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阶段。由于政府的提倡和鼓励,以及商品市场经济的需求,明代丝绸在继承前代经验的基础上,生产技术、品种花样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因而,对于明代丝绸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研究明代丝绸的资料主要包括三类:文献记载、传世品和出土遗物。科学地发掘出土的丝织品,不仅可以补充历史文献记载的缺失,以形象的资料证实文字描述,而且还能够为传世丝织品提供断代依据。但由于埋藏于地下,一般残缺不全。在这种情况下,传世品不仅是出土遗物资料的重要补充,而且也以其保存相对完好而成为说明历史的重要证据。作为传世品中重要组成部分的经皮极具研究价值。

一、明代丝织品的考古发现

就笔者所见,明代丝织品出土资料共计43处。在这些发现中,以定陵出土的丝织物最为著名。此外,江苏、江西、贵州等地也有较多的发现,其他地区的发现比较少。

(一) 北京地区出土的明代丝织品

北京地区出土的明代丝织品主要见于3处地点,即定陵¹、南苑苇子坑²、长辛店618厂明墓³。此外,西城慈恩寺⁴和德胜门冰窖口公主坟清墓⁵中也有明代丝织品的出土。

定陵于1956年5月开始发掘,1958年结束,历时两年零两个月。墓主人是死于万历四十八年的朱翊钧和先他而去的两个皇后。定陵出土了大量丝织品,保存较好的匹料177匹,衣物467件。部分匹料上保留有腰封,记载着织物的颜色、纹样、质料、用途和尺寸,有的还标有产地、工匠姓名、织造年月、监造人等内容。衣物包括龙袍、道袍、中单、裳、蔽膝、裤、女单衣、女夹衣、袄、裙等。这些丝织品的品种涉及锦、绫、罗、缎、纱、绸、绢、绒、改机、缙丝和刺绣11大类。织品上的图案多样,有人物纹、动物纹、花卉、几何纹样等。人物纹中的百子图最为生动,他们或对奕、或摔跤、或观鱼、或沐浴、或跳绳,动作各异,神情不同。动物图案除龙凤、麒麟外,还有现

实生活中的鹿、兔、蜂、蝶、蝙蝠和草虫。花卉多是象征福寿吉祥的牡丹、莲花、芙蓉、灵芝、梅花、兰花等。有的织物上还有“寿”“福”等吉祥文字。

南苑苇子坑明墓于1961年发掘清理。墓葬的年代定于正德十年（1515年）。这座墓葬结构严密完整，室内的遗物保存较好，唯丝织品的色彩因水浸而全部脱落。墓内有两具木棺，为男女合葬。棺内遗物多为丝织的衣衾，共83件。丝织品种可分为绸、缎、锦、罗、织金、妆花、刺绣等。其中，妆花类织物较多，根据地组织的不同，又可分为妆花绸、妆女缎、妆花纱、妆花罗等。缎类织物也有一定数量，包括暗花缎、素缎等。织金织物仅2件，一件是云龙纹织金绸袍，另一件是缠枝莲织金罗夹上衣。绣品也是2件，即洒线绣云龙纱裙、钉绣云龙缎夹上衣。锦用来做被面，有天华锦夹被、方棋纹锦夹被。这些丝织衣衾的纹样复杂多样，有云龙纹、缠枝花卉、水纹、松竹梅、吉祥团凤、云纹团凤等。

北京长辛店618厂明代中期的墓葬发掘于1976年。出土的丝织品包括驼色暗花缎金鹿纹方补斜襟短棉袄、酱色方格纹暗花缎斜襟夹袄、驼色暗花缎织金团凤方补女上衣、杂宝花卉纹缎半臂、万字地西番莲纹暗花缎裙、浅驼色四合连云纹暗花缎裙等。

（二）江苏省出土的明代丝织品

在江苏省，发掘出土的明代丝织品遗存有15处：泰州的胡玉墓⁶、徐蕃夫妇墓⁷和刘湘夫妇墓⁸，苏州虎丘明墓⁹，无锡惠山明代夫妇合葬墓¹⁰，无锡硕放大墙门¹¹，扬州扬庙¹²，扬州火金墓¹³，镇江钱一斋墓¹⁴，吴县东山许裕甫墓¹⁵，常州湖塘¹⁶，虎丘王锡爵夫妇合葬墓¹⁷，南京市太平门外板仓村徐达五世孙徐辅夫妇墓¹⁸，武进王洛家族墓M1和M2¹⁹，淮安县王镇夫妇合葬²⁰。其中出土丝织品数量最多的为徐蕃夫妇墓，其次为王洛家族墓M1和M2、刘湘夫妇墓，徐辅夫妇墓、王锡爵夫妇、苏州虎丘明墓也有一定量的发现，其他墓葬出土丝织品较少。

徐蕃夫妇墓位于泰州市东郊，1981年由泰州市博物馆发掘清理。根据有关资料，墓主徐蕃曾任工部右侍郎，死于嘉靖九年（1530年），他的妻子死于嘉靖十一年（1532年），二人的合葬墓系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建造。

徐蕃夫妇墓保存完好，为一椁两棺。男女两棺内包尸花缎及随身所葬衣物80余件，色彩鲜艳，质地坚韧。除少量棉布外，多数为丝织品，品种包括花缎、素缎、素绸、花绫和罗等，以花缎为主。花缎用来制作包尸布以及补服、绵袄、长衫、裙、帽子等的面料，花缎的纹样比较丰富，包括四合云纹、落花流水、八宝蜜蜂、八宝蝴蝶、八宝牡丹等纹饰。花绫巾四条，纹样有花瓣纹、连续回纹、万字如意纹、奔马和“孟”字形图案。

武进王洛家族墓M1和M2位于横山桥镇芳茂山西麓，1997年武进市博物馆对此墓进行了发掘。一号墓内有两椁两棺，系王洛与其妻子的墓葬，王洛卒于明正德七年（1512年），其妻盛氏卒于嘉靖十九年（1540年）。二号墓内四椁四棺，系王洛仲子王

昶和他的原配、继配和小妾的合葬墓，王昶卒于嘉靖十七年（1538年），其他三人生卒年代失考，推测原配夫人卒于嘉靖年间，继配和小妾卒于嘉靖至万历年间。

一号墓出土丝织品 31 件，全部见于王洛妻盛氏棺槨内。二号墓内出土丝织品 35 件，主要随葬在王昶继配华氏棺槨内，少量见于其妾杨氏墓内。随葬的丝绸制品的种类有衣服（绵袄、绵裤、夹袄、补服、衫、折裱裙等）、靴袜、寝具（寝单、枕头）和其他用品（香袋、额帕等）。这些制品的面料和衬里包括丰富的丝绸品种，有平纹组织的纱、绉纱、绢；斜纹组织的素绫、花绫（同向、异向）；缎纹组织的素缎、花缎；以及织金和勾编叠花贴绣等。以花缎和素绢为主，其次为素缎和素绫。织金工艺用于衣物的局部装饰，有片金线和捻金线两种，例如，一号墓内土黄色素绢夹袄，门襟为宽 3.5 厘米棕黄色捻金织花缎；浅棕色素绢衫，门襟为宽 3 厘米的棕黄色片金织杂折枝花缎。3 片黄棕色勾编网纹叠花贴绣素缎的出土，尤为引人注目。其技法是“用勾编花瓣和枝叶单元叠缝为梅花和牡丹，花蕊为古钱状，花轮廓用多线构成，内有红色丝线勾满并留出镂空网点纹，网点中填满金粉”，衣服由此显得富贵华丽。

两墓出土的丝织品上的图案丰富多彩：补子上有代表文、武官职的孔雀、狮子；四合如意云纹；杂宝纹；缠枝或折枝花卉纹；八宝纹；以及动植物相结合的纹饰，如凤穿牡丹、骆驼踏花、飞马树、蝶恋花、凤舞山花、仙鹤莲花等。大部分图案与徐蕃夫妇墓出土丝织品上的纹样相似，充分反应了明代中期贵族衣饰上流行的纹饰图案。

（三）江西省出土的明代丝织品

在江西省，明代丝织品主要发现于 7 处地点：玉山县夏浚墓²¹，广丰郑云梅墓²²，南城县株良公社明墓²³，南城县益宣王朱翊钊和李、孙二妃的合葬墓²⁴，广昌县明布政使吴念虚夫妇墓²⁵，德安县爱民乡明墓²⁶，以及南昌宁靖王夫人吴氏墓²⁷。这七处地点中，唯南昌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尚未见正式的发掘报告。

玉山县夏浚墓是 1962 年由江西省博物馆清理的。墓主人夏浚死于嘉靖四十年（1561 年）。墓内出土补服 5 件，服之胸前和背部各有锦绣补子一方，饰獬豸纹和云纹。其中，藏青色绢补服 3 件，黄绫补服 1 件，藏青色苧补服 1 件。

郑云梅墓于 1963 年发掘。墓主人郑云梅，死于万历乙卯年（1614 年）。此墓出土丝绸服饰 12 件，有官袍、便服、褙子和道服。除少部分服饰变色和破损之外，大部分仍完整无缺，色泽清晰。官袍 6 件，1 件为黄地折枝牡丹纹缎圆领大袖袍，前胸和后背各有锦绣补子一方，补子为金银线作斜方格锦地，以棕色绒线织绣成白鹏对飞、祥云、折枝牡丹和山等纹饰。1 件为黄地大缠枝牡丹花绸袍，内衬黄地吉祥云绸料套衫。另 4 件补子已失，分别是黄地斜云雷纹绫袍、黄地大缠枝牡丹提花绫袍、内衬黄地素绸套衫的黄地折枝牡丹花缎袍和黄地吉祥纹云纹绫袍。便服 5 件，有咖啡色地斜万字菊花纹绸交领大袖服、黄地缠枝牡丹纹缎单衣、黄地云纹绸单衣、青缎直领对襟夹衣

等。还有1件为素纱交领大袖道袍。鞋2双，分别为黑缎面和黄缎面。这些服饰是研究明代服装和江南丝绸、织绣的重要实物资料。

益宣王朱翊钊和李、孙二妃的合葬墓是1979年发现的，江西省文物工作队在当年末和次年3月对这座墓进行了清理。该墓用青砖砌成左、中、右三椁室，中室为益宣王，左室为元妃李氏，右室为继妃孙氏。益宣王朱翊钊死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李氏死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孙氏死于万历十年（1582年）。墓内所出土的冠服饰物俱为益王和王妃生前所穿戴的朝服、礼服和常服。朱翊钊棺内出土丝织品17件，主要为各种式样的花缎袍服，其次为织锦花被，袍服和被面上的图案有正楷字万寿无疆升天龙纹、篆字福寿团龙纹、万字夔龙纹、祥云团龙纹等。李氏棺内随葬锦、缎等丝织品8件（套），值得关注的是黄锦织绣牡丹花折枝纹裙，在蔽膝处彩绣云凤图案和几何形花边；其次是一件黄色织锦单衣衫，前后及通肩上部织绣云凤纹，底纹图案为香草缠枝纹。孙氏棺内随葬丝织品15件（套），其中黄色大衫4件，2件的前后和两肩部有圆形补子，饰彩绣团凤纹；另1件绣梅花、蜜蜂、双凤纹；还有1件用金线绣团凤纹，间隙则织绣牡丹花枝。纱质霞帔质地轻薄，双层加绣还有透明感，上面线绣云凤纹。黄色织锦裙上绣大朵牡丹缠枝纹。

德安县爱民乡明墓于1991年被盗，德安县博物馆随即对其进行了清理。此墓虽为夫妻合葬墓，但由于种种原因，简报仅对熊氏墓及其随葬品进行了说明。熊氏卒于嘉靖十六年（1537年）。随葬丝织品22件，包括酱色调百褶连衣裙、古铜色缎补服（“炼鹊”纹补子）、褐色提花罗的腿套和被子以及其他衣物。此墓的丝织品中出现了特别的提花技术，如在褐色暗花罗上，加提一排白色的牡丹花。白色的纬线，非常规范（约0.5毫米），像纸一样扁平。

（四）贵州省出土的明代丝织品

贵州省发掘出土的明代丝织品主要见于3处：惠水县城关明末刘姓夫妇合葬墓²⁸、思南县张守宗夫妇合葬墓²⁹和玉屏城关塔坡曾凤彩墓³⁰。

1983年3月，贵州省博物馆在惠水县城关清理了明末刘姓夫妇同冢异穴墓。墓中出土的丝织品主要有：绸面布里长统靴1双、绸面护膝1对、青绸补服1件、绿绸长袍1件、浅褐色万字如意纹绫夹袄1件、谷黄绸面短袄1件、檀色提花流云纹绫裙1件、青缎面儒巾1顶、绀色调腰带1条、青缎面方袋1只。其中补服的补子上为绿地缙丝白云鸂鶒图案，每个补子上有五只鸂鶒飞翔于云间，构图严谨，形象生动。

1978年2月，贵州省玉屏城关塔坡发现明代七品官员曾凤彩墓，墓主人死于天启六年（1626年）。墓中出土七、八件简单葬服，有的还有补钉，系生前使用过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件茶色如意云纹暗花缎补服，胸前补子为深褐色素底丝纱，金银线绣一对鸂鶒鸟，四周绣以流云纹，线条流畅。补服佩一条浅绛色缠枝牡丹纹缎带。经

有关部门鉴定,补服的衣料产自南京或四川等地的官营作坊。

1980年3月,贵州省博物馆清理了思南县河东公社万胜山顶的张守宗夫妇墓。张守宗死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其妻的死亡年代不明。墓葬出土纺织品61件,其中单衣、夹衣、袄、裙子、袖套、鞋等37件,被子13件,其他织物11件。丝绸品种涉及缎、绢、绫、纱、绸、罗等,以缎的数量居多。这批纺织品的图案十分丰富,有动物、植物、几何纹等题材,除明代丝织品上常见的万字纹、四合如意云纹、折枝花卉、缠枝牡丹外,还有充满生活气息的荷花水鸟、莲塘鹭鸶等。这批丝织品中最为珍贵的是驼色荷花白鹭缂丝袖套,缂丝用不同深浅的土黄、土红等色丝线以“通经断纬”法织成。麒麟芝草莲塘鹭鸶纹茶色罗裙也十分珍贵,其色泽鲜明,图案生动。张守宗墓出土的丝织品,有许多具有鲜明的民间工艺特色,是研究明代纺织技术和审美情趣的重要实物资料。

(五) 明代丝织品在其他地区的发现

除上述地区外,明代丝织品在上海、浙江、湖北、山东、四川、甘肃、广东、福建等地也有少量出土,但数量较少,有一些墓葬的丝织品遗存保存比较差。主要墓葬有:上海市松江县诸纯臣夫妇墓³¹、顾守清与张永馨道士墓³²、卢湾区潘允激墓³³,浙江缙云飞凤山卢氏墓³⁴,湖北省张懋夫妇合葬墓³⁵,山东邹县朱檀墓³⁶,四川绵竹县明代中后期墓葬³⁷、新都县明墓³⁸、成都市郊明墓³⁹,甘肃兰州附近的方家庄刘漳夫妇墓⁴⁰,广东省广州市戴缙夫妇墓⁴¹,福建省晋江深沪明墓⁴²和福州市马森墓⁴³。出土丝织品相对较多,且发表资料较为详细的有三处,即朱檀墓、戴缙夫妇墓和张懋夫妇墓。

朱檀墓位于山东邹县境内,于1970年春到1971年初发掘。朱檀是明太祖的第十子,封鲁王,死于洪武二十二年。朱檀墓随葬的衣物部分已破散、腐朽。主要丝织品有:米黄色织金缎龙袍、米黄色盘领窄袖织金龙袍多件、交领右衽中单纱袍多件、交领暗花云纹袍、交领波绉纹袍、交领短袖素面袍、短袖纱袍、纱褂、纱裤、绣花棉被、缠枝纹、条格纹、福寿字丝带等,简报中对有些衣物的质地未做说明。

戴缙夫妇墓位于广州东山梅村的南面,于1956年至1957年清理。据墓志讲戴缙妻下葬于弘治十八年(1505年),正德八年(1513年)戴缙才与之合葬。该墓出土的丝织在开棺时看上去还完整,颜色也很鲜艳。开棺通风后,即逐渐变色,一触即破。在出土之后的各个品种的织物中,缎类保存较好,绸绢类多已破碎。戴缙棺内出土丝织品约20件,有被子、衣服、帽子、巾、垫等类,周氏棺内丝织品不超过10件。主要遗物有:织花缎夹被、织花缎袍、织花绸袍、织花缎衫、绸裙、金线绣麒麟纹补服、缎制软帽、缎帽兜、金线绣花裙、绸制长囊等。

张懋夫妇墓位于湖北省广济县,于1983年3月清理发掘。张懋死于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其妻死于正德十一年(1516年),夫妇合葬于正德十五年(1520年)。

张懋棺内随葬丝织品 20 多件,包括黄色和浅黄色云纹缎(报告中称为锦,疑有误)长袍各 1 件,黄色云纹万字格和浅黄色梅花纹缎(报告中称为锦)长袍各 1 件,素缎长袍 2 件,黄色素缎罩袍 1 件,黄色绸罩袍 1 件,浅黄色绫棉袍 1 件(里子为枝蔓芙蓉花黄绸)素缎百褶裙 2 件,万字几何云纹缎(报告中称为锦缎、织锦)百褶裙 1 件,花草云纹缎(报告中称为锦缎、织锦)百褶裙 1 件,黄褐色几何花卉纹缎(报告中称为锦缎)腰裙 1 件,浅黄色平纹绢禅衣和夹裤各 1 件,黄褐绸披风帽 1 件,黄色素缎睡帽 1 件,素缎云头鞋 1 双,花草纹绢被 1 床,绢面褥子 1 床,黄褐色平纹绢枕头 1 个。张懋之妻的棺内随葬了一块刺绣织物,绢地上用金黄色丝线绣出展翅而飞的凤鸟,线条流畅,形态生动。

明代出土的丝织品主要是 20 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发现的。出土这些丝织的墓葬年代多为明代中期和晚期,个别为明代早期。所出丝织品的品种多样,图案纹样繁多。在资料的发表上,大多数关注的是丝绸品种、衣物的形制和装饰纹样,对织物的组织结构未做分析。资料信息的不充分,无疑会影响到资料研究作用的发挥。

二、明代丝织品的收藏

除了考古发掘出土以外,明代丝绸还以传世品的形式收藏于博物馆或其他形式的机构中,在私人手中也可以见到。由于我们的主旨在于概述明代丝绸存世的情况,所以,这里谈及的收藏是指博物馆里保存的明代传世丝织品。传世品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从未入土的文物;二是虽为出土品,但出土地点已无从查考,文物已在世上流传很长时间。由于资料收集过程中的种种限制条件,本文所及的收藏情况难免有所遗漏。

故宫曾是明代的皇宫,度藏数万件明代织绣文物,绝大部分是当时的珍品。其来源有各地官办织造专门为皇室生产的御用品,有边疆少数民族进贡的贡品,还有宫廷从各地采办的织绣品等。数量之巨、类别之全,海内外绝无仅有。故宫藏明代织物主要有缂丝、起绒织物、双层织物和锦、缎、绫、罗、绸、纱等。其中许多织物除故宫外很少有收藏,可以说,故宫藏品是研究明代织物最丰富、完整、宝贵的实物资料⁴⁴。故宫博物院编辑出版的《明清织绣》⁴⁵收录明代织绣精品 100 余件,有袍料、匹料、经皮、裱片和刺绣册页等,所涉及的丝绸种类也比较全面,例如:缂丝地龙纹寿字裱片、木红地凤凰纹双层织物、蓝地福寿双鱼纹双层织物经皮、绿地云蟒纹妆花缎、绛色地龙凤穿花纹暗花罗、绿地织黄牡丹寿字纹二色绸经皮、红地莲花牡丹纹妆花纱、白绫地绣彩罗汉朝瑞图册页等。

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传世的明代织绣文物 2000 余件⁴⁶,包括大藏经裱封、衣料、各类观赏品以及宫廷和民间的生活用品等,其中有不少是国家级珍品⁴⁷。《明清织绣》⁴⁸一书,对该馆明代织绣的收藏情况有一定的反映。

首都博物馆藏的明代丝绸中,既有传世品,又有出土遗物⁴⁹。其品种多样,有罗、

纱、锦、绢、绫、缎、缙丝等，涉及袍、褂、衣、裤、裙、袜、被等实用品和绣画之类的观赏品等。藏品中最为称道的是上文提到的南苑苇子坑夏儒墓出土的各类丝绸服装⁵⁰。

南京博物院所藏的明代丝绸，可以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织绣》⁵¹一书中有些许了解。此书中收录了明代丝绸刺绣作品16件，其中多为顾绣，件件堪称精品。包括缙丝西游记人物故事手卷、缙丝人物风景手卷、米色缎地顾绣竹林七贤图轴、缎地顾绣柳荫洗马图轴、白缎地顾绣达摩像轴、顾绣游赤壁图轴等。这些刺绣作品用料考究，绣工精良，可从多个角度进行研究。

上海博物馆也收藏有明代丝绸。在《上海博物馆藏品精华》⁵²一书中，收录1件明代韩希孟刺绣作品，名为顾绣花卉鱼虫图册。图册四开，绫地上彩绣花卉鱼虫。韩氏运用套针、缠针、滚针等针法，以写实手法表现了画绣的神韵。

中国丝绸博物馆所藏的明代丝绸，在《织绣珍品》⁵³中可见一斑。此书收录该馆明代丝绸4件，其中两件为出土遗物。另外两件未标明出土地点，似为传世品：其一为四季寿庆暗花缎，此缎采用明代流行的正反五枚缎作基本组织，在一个循环中织出牡丹、荷花、菊花及梅花等代表四季的花朵，绶带鸟在花丛中飞舞；其二为蓝地妆花蟒袍料。

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明代丝绸，在《宋明织绣》⁵⁴中有所反映。这本图录收录了明代韩希孟刺绣六幅，图案题材包括牡丹、蔷薇蜜蜂、萱花蝴蝶、白菜、芙蓉翠鸟和梅花水仙等。此书的主旨在于以图片的形式展示顾绣的精湛技艺，文字说明很少。

北京服装学院收藏有明代经皮100余件。西藏自治区博物馆、罗布林卡、大昭寺、布达拉宫等收藏较多明代织物。

在中国，除了上述博物馆对明代丝织品的收藏外，香港也可见到明代丝绸的收藏。《织绣珍品》⁵⁵一书中就收录了三件，分别是：缎地妆花不空如来像，藏于香港艺术馆；织金缎地纳纱绣千佛袈裟，为香港贺祈思藏品；绢地五彩八宝夹缬，为晚明至清早期的产品，也是香港贺祈思藏品。此外，明代丝绸在海外也有所收藏。《织绣珍品》⁵⁶一书共收录了四件海外的明代丝绸藏品，包括现藏于伦敦斯宾克公司的一件八达晕织金锦，年代为元至明代初期；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刺绣捧螺仕女⁵⁷；以及两件伦敦私人手中的藏品，即童子骑羊妆花缎和艾虎五毒回回锦。

三、明代丝织品的研究状况

从研究内容和性质来看，明代丝织品的研究大致包括下列几方面：

关于明代丝织品的综合论述。有关研究一方面见于丝绸通史类的著作中，比如朱新予主编的《中国丝绸史》⁵⁸中对明代丝绸的生产区域、品种等进行了概述，赵丰在《丝绸艺术史》⁵⁹一书论及了明代丝绸的品种和艺术风格，《织绣珍品》⁶⁰一书则包括